

文学与艺术，挽手前行

——写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语言文学系成立之际

祝东力

今年5月31日，中国艺术研究院成立了中国语言文学系，这是一件大事。

文学传统在我们院，可以说渊源有自，尤其是以周汝昌、冯其庸、李希凡、陆梅林、程代熙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小说史和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但是，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就学科专业的覆盖面来讲，这毕竟是一个“小传统”。我想说的是另一个“大传统”。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各艺术史论专业的诸位先贤，像张庚、王朝闻、黄翔鹏等，他们分别在中国戏曲史、中国美术史、中国音乐史诸领域卓有建树，是一代宗师和泰斗。但与此同时，他们的文学造诣之深湛，甚至称之为文豪级的人物，也不为过。张庚、王朝闻，学界都比较熟悉。黄翔鹏，是中国传统音乐史领域，特别是乐律学领域的大专家，另一方面，他仿屈原《天问》体所撰作的《乐问》，对传统音乐史的一系列疑窦给予叩问，义理、考据、辞章俱佳，其行文之古雅典丽，令人叹服。诸位先贤，其文学上的造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各自艺术史领域的格局和成就。

那么，文学对于艺术而言，究竟

意味着什么？我们当然可以泛泛地说，文学是艺术的某种基础，但这句话说，到底怎样理解？在我看来，文学的造诣，当然意味着读破万卷、下笔有神，广阔的生活画卷给人心以滋养，并转为刻画抒写的生花之笔。但文学的造诣还有更深一层意义。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对语言，包括文字的音、形、义及语法、句法进行推敲和研讨，是文学的应有之义。在这个意义上，在不同语境中，我会以“文学”代指中国语言文学专业。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过一句名言：“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就是说，没有语言的“思想”不具有现实性，不存在独立于语言的单纯的所谓“思想”——这个命题其实是20世纪语言哲学的基本结论。语言对“思想”有整理、型塑和格式化的作用，推敲词句、遣词造句，这种对语言的锤炼和营造，本身就是对“思想”的构建、磨砺和审视过程。更进一步，文学对于艺术研究还有一种最深刻的关联，那就是：无论是艺术史论研究，还是艺术现状研究，作为其研究方法的基础部分，都包含有大量主观感性的审美体验，毫无疑问，没有文学这一“语言的艺术”，研究者就难以捕捉和摹

写这种细腻微妙的内心体验，内心体验就无法清晰呈现。

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既无形又深嵌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各门类艺术的研究中。这是它隐含的文学传统，是大传统。另一方面，小传统以前述的中国古典小说史和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等专业为代表，是外显的文学传统。在我们院，文学与艺术一向就是这样经纬交织。现在，由这些传统，终于汇聚成一个专门机构，可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这个由我们院的大、小传统所促成的中国语言文学系，应该有其特点，不必混同于普通综合大学。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有最完备的艺术门类的研究和教学体系，像戏曲、美术、音乐、舞蹈、话剧、电影、曲艺、摄影、设计、建筑等，各艺术门类的研究和教学早已形成了各自的品牌和传统。因此，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中文系，总的来说，会呈现某种与各门类艺术相融合的“跨学科”的特点。例如文艺学，是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二级学科，它在关注文学自身问题的同时，也会把“语言的艺术”同邻近的戏曲、美术、音乐、舞蹈、话剧、电影等艺术形式的特点，包括其优点和短板进行比较研究。还有，汉语言文字学，同

文艺学一样也是二级学科，在这里，它将强调同书法艺术的内在关联，例如，汉语言文字学将把有关汉字源流的梳理同书法演变的考察结合起来。

中文系与已有的艺术研究传统交融融合，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它还应自身的拓展空间。文学，是对人心冷暖、人世沧桑的关切和感慨、洞察和书写。我们希望，通过文学，通过对广阔生活画卷的关注和探究，第一，向当代延伸，重视对文艺新经验、新问题的关注和评论，以校正某些艺术门类研究中过于偏重传统史论而忽略当下现实的“一头沉”现象。第二，向理论提升，打通与社会科学之间的阻隔，引入社会历史的主题，心存大目标，关注大问题，以弥补某些艺术门类研究中沉迷于细节而思想空洞的弊端。总之，中文系可以对我们院科研和教育发展的整体格局有所裨益。

中国艺术研究院成立中文系，是老树发新枝，需要上下同心，在优秀生源加入之后，灌溉之、养育之，假以时间，必能开出特色、办成品牌，桃李芬芳之日，亦可期许。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语言文学系首任系主任）

晏阳初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冯俊锋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新时代条件下农民富起来、农村美起来描绘了宏伟蓝图。承接并激活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等传统文化资源，成为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的现实呼唤。而巴蜀骄子——享誉世界的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晏阳初，无疑留给当下中国乡村振兴一份丰厚的文化遗产。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持续战乱，民不聊生。拯救凋敝的中国乡村成为众多知识分子教育救国的使命召唤。1890年生于四川巴中的晏阳初，从美国耶鲁大学留学归来，投身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工作。1926年，晏阳初带领他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以下简称“平教会”），选择河北定县作为试验区，进行轰轰烈烈的“民族再造”的乡村建设实验，史称“定县实验”。作为荣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大伟人”之一的晏阳初，其一生改变了世界上亿万贫苦民众的命运，至今仍被视为现代化的路标之一。

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思想体系，是在踏遍长江沿岸多个省份农村进行实地考察之后形成的。在他看来，“救济乡村”与“办模范村”并不是最

重要的。他在《农村运动的使命》一文中直陈要旨：“中国今日的生死问题，不是别的，是民族衰老，民族涣散，民族堕落，根本是人的问题……”在他的观念中，国家三要素是土地、主权和人民，“人民”是三要素中重中之重，有了人，土地、主权可以失而复得。所以，晏阳初着眼农民“四大教育”：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直接对应中国乡村的“愚”“穷”“弱”“私”。而“四大教育”以“学校式教育”“社会式教育”“家庭教育”等“三大方式”实现。“定县实验”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四大教育”将中国80%以上的农民改造成有文化的中国新农民，即所谓“化农民”，而承担“化农民”使命的知识分子必须“农民化”，才能与他们打成一片，从而影响和改造他们。

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期望达到建设新乡村，创造新生活，改造新人民的目的。他力主教育者先受教育，与平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从农民生活中找材料”，根据农民需要编写适用的教材。“教育的内容就是建设的需要，教育的过程就是建设的过程，教育就是建设活动。”“使农

业科学深入民间”是晏阳初乡村建设理论的重要支撑点。他引进西方科学实验室方法，以此研究农民的旨趣和特质。在“平教会”创建之初，他就十分重视“科学”与“民众”的“两结合”。晏阳初所说的“民众”，准确说专指农民。晏阳初曾网罗了一大批农业科学家、高级知识分子去定县农村实地调查研究和实验，“从农民的实际生活中找出切肤之问题，应用科学的实验，以求答案。”遗憾的是，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晏阳初和他的乡村建设实验被迫中断。

回望晏阳初的“定县实验”，从治理理念和制度设计上突破了乡村治理方式，找到了通往善治的乡门。定县乡村制度的推行，使农民亲身参加了民主选举与民主管理，开启了农民现代意识，也为妇女解放并带动妇女的政治觉醒奠定了基础。重视乡村教育，大兴办学之风，并形成了相对完备的乡村学校和教育体系。“平教会”主持的教育科技下乡广受欢迎，农作物不断改种改良，农村合作社纷纷建立，农民生活得以显著改善，定县农村一时欣欣向荣。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乡村

振兴乡风文明是关键”，要实现“共谋、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现代化，我国广袤的农村需要从中国数千年优秀文化传统中寻找与当前乡村治理、经济结构相结合的破解乡村治理困局的药方。晏阳初乡村建设思想，给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带来了启示。用好、活用晏阳初乡村建设思想这一丰厚的文化遗产，是众多有识之士的共同愿望。

可喜的是，近年来巴中深入挖掘晏阳初思想，把晏阳初作为巴中“三张名片”之一，打造晏阳初小镇、开办农民夜校、开设“晏阳初讲堂”……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思想在巴中已经发扬光大。值得提及的是，巴中市在100多个贫困村开设“晏阳初讲堂”，突出晏阳初“四治”载体，围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结合秦巴山区决胜脱贫攻坚的实施，结合巴中身边人、身边事，以此影响、教育群众，从而激发群众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的内生动力。晏阳初的乡村建设理论，不仅为巴中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历史经验，对当代中国的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也是一份可资借鉴的历史遗产。

好作品都是精雕细琢出来的

袁莉

艺术创作的方法因人而异。自古以来，虽然不乏“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道上酒家眠”“一杯未尽诗已成，涌诗向天亦不惊”这样的天才偶得、立马可待之作，但更多青史留名的经典作品，大多都凝聚着“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精神。正如曹雪芹在《自题》中谈到《红楼梦》的写作所谈：“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这种对作品精耕细作、甚至用生命去创作的品格，值得当下艺术创作者去秉持和坚守。

在小说、绘画等个体独立创作的艺术作品中，创作者的主观意识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而戏曲、歌剧、舞剧、话剧等舞台艺术，融合了表演、服饰、化妆、道具、灯光、布景等多种艺术门类，它们既要自成体系、各自精彩，又要彼此协调、融会贯通，层次丰富、头绪多元，运作复杂。一台优质的舞台剧表面看去行云流水，起承转合连贯自如，实则需要多种艺术门类如齿轮啮合般精密准确地配合运转，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的小小瑕疵，都会影响整部剧的成色，尤其是撮取传统文化

之精华而编著的历史剧目，细微到一句与史实相关的台词、一个扮相、一支帽翎，都须与历史典籍籍绝对照核实。也正因为此，舞台艺术更需群策群力，一点一滴修缮漏洞，打磨圆融。

近日，国家艺术基金为2018年度滚动资助项目召集了专家研讨会。这些滚动资助项目主题丰富、剧种多元：由上海歌剧院出品的讲述人民音乐家聂耳与左翼戏剧家田汉共同创作《义勇军进行曲》背后故事的大型音乐剧《国之当歌》，中国人用外语语言讲外国故事、上海芭蕾舞团出品的世界名作芭蕾舞剧《哈姆雷特》，演绎武训乞讨办学史实、上海淮剧团出品的淮剧《武训先生》，弘扬爱国情怀与清正风气，绍兴小百花越剧艺术传习中心出品的越剧《屈原》，再现民族实业家家国情怀、江苏南通艺术剧院创排的话剧《张謇》……每一部都是经过专家群严密思考、反复论证之后，从同类作品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本身已经具备经典之作的深厚基础，也都经受了市场与口碑的双重考验。

虽然项目主体及项目类型迥

异，但在演出中饱听专家建议及群众反馈，不断对作品进行微调甚至大调，使其在反复打磨、精雕细琢中臻于完善，是这些剧目的共同特点。以“七年磨一剑”的音乐剧《国之当歌》为例，据上海歌剧院副院长、剧目主创李瑞祥介绍，该剧自从2011年创排、2012年公演以来，在全国各地上演130余场，不仅在全国大剧院演出，也组织全国巡演、应邀出国演出、下基层进社区演出，所演之处，无不群情激越，引发了民众火热的爱国之情。为了达到“接地气、求真实、亲民众”，在不断的演出中，剧本和演出效果逐渐完善，甚至为了精益求精，曾经“改得面目全非”。“在制作和演出当中对艺术标准有精致、精湛的要求，对任何瑕疵零容忍。到现在我们都有一个习惯，包括我在内，每一次演出必须坐在下面记录，每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必须现场下来立刻解决，下一场决不允许再犯……只有这样不断加油努力，才能保持高超的艺术水准。”同时，为了适应不同的演出环境，也发展出交响乐团伴奏的剧场版、巡演版以及小型的

校园版等不同的演出版本。“这部剧就像孩子一样，看着他一步步成长起来。”怀着对作品如骨血般的爱，“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钻研精神，“与时代同呼吸，与祖国共命运”的文艺担当，在持久的淬炼中，《国之当歌》不仅赢得了群众的心，也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站稳了脚跟，达到了社会效益与市场效益双丰收。

即便如此，依然还有提升的空间，艺术之路是无止境的。面对这些已经成绩斐然的优秀作品，专家们在肯定其优异之处的同时，也在表演、舞美、唱腔，甚至演员一个眼神、一个身段、一个唱词等各个方面“鸡蛋里挑骨头”。在滚动资助项目实施的第三年，国家艺术基金把工作重心放在剧目的“改”上，聚焦“目标要细，责任要细，措施要细”，集中多方力量，以工匠精神去雕琢、去打磨，使它们在艺术修为上化境入微、渐成高峰，真正成为我们这个时代能在舞台上立起来、在人民心中留下来、为子孙后代传下去的经典之作。

潮声

在又一批学生毕业之际，作为老师的我，想要按照年代顺序，跟同学们分享几个我亲历的小故事。

第一个是关于王进喜的故事。40多年前我读中学时，语文老师曾布置我们写一篇有关他的命题作文，从此，王进喜的名字和事迹就一直留在我的记忆深处。1959年，王进喜来北京参加国庆观礼时，看到街头行驶的公共汽车上都背着又笨拙又难看的“煤气包”，才知道国家缺油到了如此地步。作为一名石油工人，他感到一种莫大的耻辱，当即蹲在街头哭了起来。他说他恨不得一拳头砸上一口油井来，把“贫油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1970年，王进喜病逝，享年47岁。然而，他的那句“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豪迈誓言，他的那种“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铁人精神，不仅感动和激励了像我这样的一代人，而且有着永恒的生命力。

第二个是关于“选择”的故事。1993年底，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管理学系从学院分出去，成立北大工商管理学院，即现在的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院在原有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金融专业的基础上新增了保险学专业，院里把我从经济系调来组建这个新专业。1994年8月，学院送我去美国学习保险学。一年以后回国，一家猎头公司找到我，说是一家美国公司开出了30万元的年薪诚邀我加盟，我不假思索地就婉拒了。猎头公司的人有些不解地问：“孙老师，这只是个开价，你可以提你的标准。”我说不是钱的问题。“那是什么？”她问道。我说一来是因为我喜欢当老师，二来学院把我送到国外去学习，是为了保险学科的建设，我不能违背这个承诺。不是说地球离了谁就不转了，但当时第一届学生已经入校，而在专业初创期的三位老师中，一位60多岁的老教师不带本科生的课，另一位当时还在美国做访问学者，如果我再离开，连教课的老师都没有了，遑论专业建设。当猎头公司的人得知我在北大的工资以后感慨地说道：“孙老师，你在北大的月薪只有400多元，而这家公司给您开出的月薪是1000元。虽然我没开出您的一段话，但我敬重您。”言而有信，承诺的事情就必须去做，而且要想办法做到最好，否则就不要答应。”这是我父母从小对我的家教，这也是最朴素的契约精神。

第三个是关于德国的故事。2007年3月，我收到德国一家著名机构的邀请，去慕尼黑参加一场题为“2017之后的世界展望”的会议。请注意，我没有说错，是2017年，十年以后的世界展望，由此可见德国人的远虑与前瞻。会议规模很小，只有该机构的所有董事会成员加上他们从世界各地邀请的8位演讲人。会议计划在10月召开。不久，我又收到对方联系人的一封信件：“孙教授，听说您6月份要去美国参加国际保险学会的年会，恰好我们战略部的老总也会去，他希望能约您一起吃个早餐，当面再沟通一下会议的一些细节。”当6月我和该机构战略部的老总在见面以后，他把会议的背景等情况又跟我做了详细沟通。10月份，会议如期召开。我们来自全球不同国家的8位专家学者每人分别做了15分钟的演讲，然后是大家讨论。回国不久，我又收到了这家机构发来的感谢信以及所有会议材料的汇编。一个20多人参加的为期一天的会议，半年的准备时间，无数次的邮件沟通，会前见面……我真的为德国人的严谨所震撼。也就是从这件小事上，我读懂了“德国制造”的涵义和工匠精神的真谛。

第四个是关于“两弹城”的故事。虽然之前我对邓稼先等“两弹一星”功臣们的事迹略有了解，但当2017年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去四川绵阳参观了“两弹城”以后，那种精神洗礼和震撼还是难以用言语来表达的。上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所有专家，并断定中国人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但“两弹一星”的功臣们硬是在“一穷二白”的艰苦环境中，以信仰为动力，以生命为代价，仅仅用了几年的时间，就令全世界见识了中国人的聪明与智慧、坚韧与不屈、自信与豪迈。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两弹之父”邓稼先于1958年接受任务临行前与妻子许鹿希有过这样一段对话：“我要调动工作了。”“去哪？”“不能说。”“去干什么？”“不能说。”“那

大学生走向社会，需要五种「精神」

孙祁祥

我给你写信。”“不能通信。这个家以后就靠你了，我的生命就献给这个将来要做的工作了。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有价值，就是为他死也值得。”这是一段朴实得不能再朴实、但绝对撼人心灵的心灵对话。“可以说，没有这些为中国‘两弹一星’事业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就不会有今天中国站在世界舞台中央的底气和魄力。”——这是我当时在“两弹城”经济学院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举行揭牌仪式时，泣不成声说出的一段话。我希望北大经院青年学子以及更多的青少年能够去那里致敬英雄、学习英雄、争做英雄，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奉献精神。

第五个是关于“打工”的故事。前不久有一位已经毕业了几年的学生回来看我，我问他工作情况，他说“我跳槽了”，然后补了一句，“反正在哪都是给别人打工。”我的这位学生不是在抱怨，他只是在用目前社会上很流行、时髦的一句话来说明他的现状。我不知道是自己落伍，还是位置摆得不对，因为我似乎从来没有为别人打工的概念和意识。不管是我当年做知青还是当话务员；不管是我当老师还是“双肩挑”的管理者，我一直都很珍惜得到的每一个工作机会，一直认为是在做自己应当做的事情。如果非要用“打工”这个词的话，那就是，我一直在为自己打工。我很欣赏日本著名实业家稻盛和夫的人生信条：“始终以光明正大、谦虚之心来对待工作。敬奉天地、关爱世人、热爱工作、热爱祖国、热爱国家。”我始终认为，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具有“主人翁”的意识和精神，认认真真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那么，这个社会会更加和谐有序、富足安康。

毛主席曾经这样说过：“一个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正是靠着这种精神，中国人民在战争年代浴血奋战，在建设年代披荆斩棘、在改革年代攻坚克难。中华民族从一个任人宰割的民族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民族；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成为一个屹立于世界舞台中央的国家。岁月流转，沧桑巨变，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标志和气质，但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一脉相承。

同学们，当年你们来到经院的时候，我曾对你们说：“希望你们带着独立、质疑、求新的精神来这里学习。”今天，在你们即将离开学院的时候，我跟你们分享这五个小故事，是希望你们在未来的道路上，在继续以“独立、质疑、求新”的精神探寻真理、获取真知的同时，以北大“从我做起”的自律，以铁人精神、契约精神、工匠精神、奉献精神和主人翁精神，来塑造人格、完善自我；来服务社会，报效祖国。

（本文选自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孙祁祥教授在该院2018届毕业生典礼上的致辞。标题为编者另拟。）